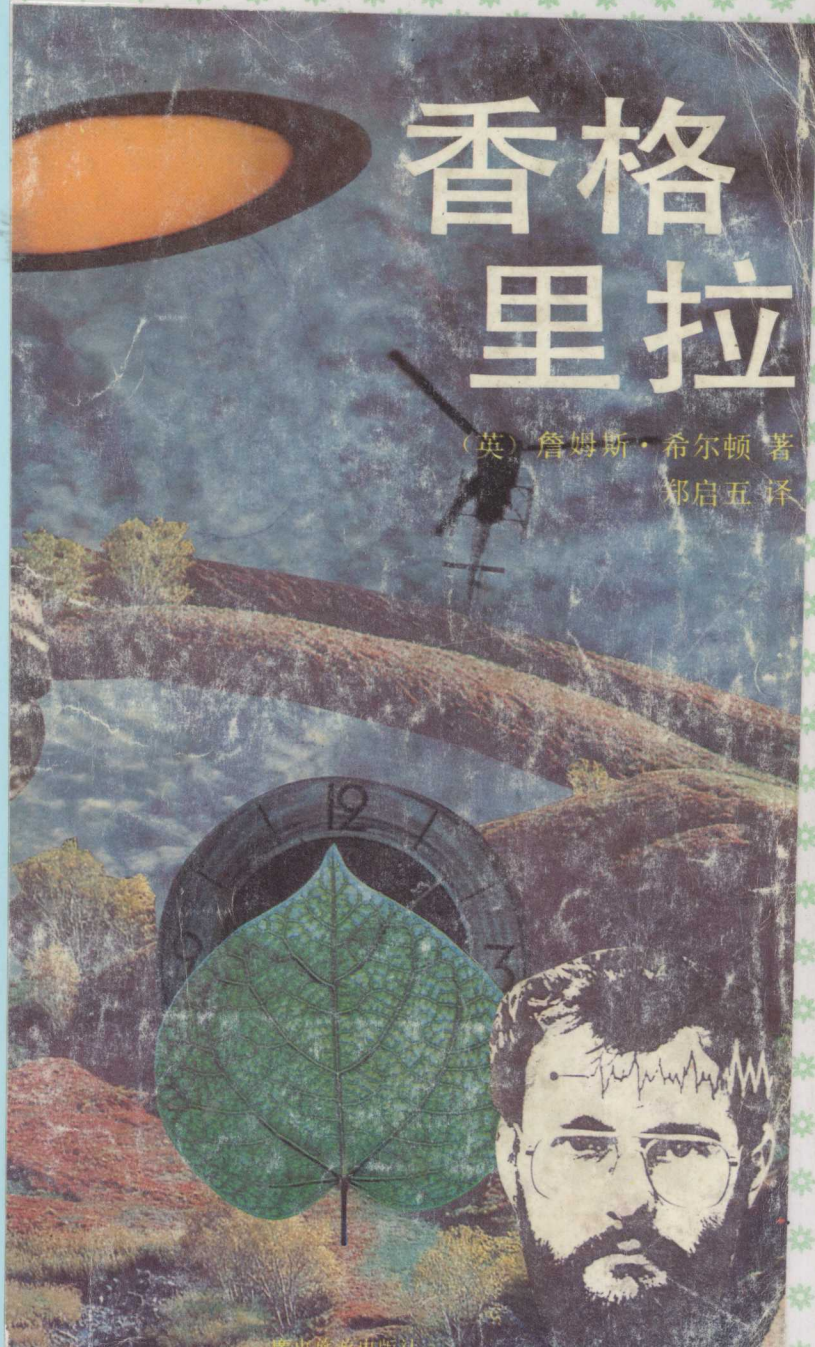


香格里拉

(英) 詹姆斯·希尔顿 著
郑启五 译



香格里拉

〈英〉詹姆斯·希尔顿著

郑启五译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广州

序幕

香烟燃得很短。通常老同学们重聚，发现各位与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于是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很折磨人的。我们开始默默地品尝着这种折磨人的滋味。拉瑟福德写了几部小说，怀兰特是英国驻当地大使馆的秘书，此刻他正在坦佩尔夫机场请我们吃饭。我想这一餐吃得并不太愉快，但是大家都不露声色。在这种场合下，外交官天经地义是要请客的。这一切，看上去不外是三个英国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外国的首都小聚一下而已。

我几乎作出了结论：我印象中的怀兰特那有点自命不凡的特点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失而消失。相形之下，我更喜欢拉瑟福德，这个早熟的小子过去我对他又是恫吓又是庇护，现在他可完全从瘦骨架上脱颖而出了。他可能赚了不少钱，过着更得意的生活。这种可能性使我与怀兰特产生出同感——一丝妒忌。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傍晚过得远非沉闷。我们观赏着卢夫特——汉莎公司的大型飞机从中欧各地飞抵机场的跑道。夜幕将临，弧光灯大放光明，使景观多彩多姿，辉煌得如同剧场一般。飞机中有一架是英国的，它的驾驶员身着航空衣，路过我们的餐桌边时，举手向怀兰特敬礼。可怀兰特看了两眼才认出他来，并将其一一介绍给我们。这位陌生人便应邀入座。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小伙子，名叫桑德斯。怀兰

特抱歉地解释说，当飞行员都身穿航空衣，头戴飞行帽时，几乎千人一面，很难辨别。

桑德斯闻之，哈哈一笑，回答道：“对呀，是相当容易混淆，这我很清楚。别忘了我在巴司库呆过。”

怀兰特笑了，但不太自然，而后话题便转到其它方面去了。

桑德斯为我们一伙增添了魅人的活力，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约莫在10点10分，怀兰特到邻桌与他人说话，拉瑟福德突然抓住这间隙的功夫，问道：“顺提一句，你刚才说到巴司库，我对那个地方所知甚少，你话中有话，是指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桑德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哦，那指的是我当时在部队服役时发生的一件麻烦事。”他年龄不大，肚中的秘密难以久藏。“事情是有一个阿富汗人或阿福里迪人或其他什么人，反正有一个人偷了我们的一架飞机飞跑了。你想象得出这可是一件最糟糕的事。那个家伙伏击了我们的飞行员，把他击昏，并剥了他的航空衣，神不知鬼不觉爬进机舱。他发出了正常的信号，接着便非常出色地升空而去。问题在于，他从此下落不明。”

拉瑟福德饶有兴味地问道：“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哎呀，大概在一年前吧，5月31日，我们当时正从巴司库往白沙瓦撤离侨民，因为当地发生了暴乱——这事你也许还记得吧。当时比较混乱，否则偷飞机就不可能。可事情到底是发生了，这事表明，是航空衣使那人钻了空子，不是吗？”

拉瑟福德越听越有兴味。“我以为象在那样一种场合里，一架飞机总不至于只有一个飞行员吧？”

“是不止一个飞行员，所有的军用运输机通常都有好几位飞行员。但被偷的是一架特种飞机，它专门为当地的土邦主制造的，装配特别。印度的勘察人员向来用它在克什米尔山区做超高空飞行。”

“你是说飞机始终没有飞到白沙瓦？”

“始终没有。据我们所知，从未听说它降落在任何一个其它地方。怪就怪在这里。当然，如果那个家伙是什么游牧部落的人，他很可能把飞机往山里飞，企图绑架机上的旅客以谋得一笔赎金。但我想机上的人都完蛋了，那边远地带到处都是飞机的葬身之地，而且往往是撞得无音无讯的。”

“是的，我知道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名乘客？”

“我想有四位，三个男的和一位女传教士。”

“瞎碰碰，男的当中可有一个名叫康韦的？”

桑德斯大为惊讶：“是呀，是有‘荣耀的’康韦。您认识他？”

“他和我过去是同学。”拉瑟福德有点不大自然地说。

“他是一个令人愉快、办事精明的人材，所有有关他在巴司库的描述都是这么说的。”桑德斯继续说道。

拉瑟福德点点头，说：“是的，这没有疑问……，可事情太奇怪了……太奇怪了……”他似乎好一阵子茫然不知所措，然后又集中了思路，接着说：“报纸从未作过报道，否则我一定不会漏看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桑德斯看上去突然显得十分别扭，我想这一问正中要害。“老实告诉你吧，”他答道，“我看来是把不该说的也抖出来了，可能这事现在说说已问题不大。那消息早过时了，就让它呆在旧货店里吧。它被密封了起来，我指的是这事发生的经过。因为它不好听，政府的人只是声称他们有一架飞

机失踪了，并提了一下乘客的名字，因而并没有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

话说到这个节骨眼上，怀兰特又回到我们的桌上。桑德斯有点抱歉地对他说：“怀兰特，我们正在谈那个‘荣耀的’康韦。我把巴司库的往事端了出来，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怀兰特神情严肃地沉默了片刻，他持这种官方的态度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终于说道：“我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提请你注意。我向来认为你们航空人员应该自重自爱，别扯那些不该扯的事情。”这一下就把桑德斯给镇住了。

接着怀兰特转过身来，相当有礼貌地对拉瑟福德说：“当然，这不关你的事，但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有时候在前线上发生的事是不得不有所保密的。”

“可另一方面，也有人其痒难耐，渴望探知真情。”拉瑟福德冷冰冰地回了一句。

“当然，如果有人有理由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怎么掩盖也无济于事。当时我在白沙瓦，这事我最清楚。你与康韦很熟吗？我指的是毕业后的日子。”

“只在牛津大学见过几面。你常见到他吗？”

“在安卡拉见过，当时我派驻在那里，见过一两次面。”

“你喜欢他吗？”

“我想他很聪明，但是相当懒散。”

拉瑟福德微笑道：“他的确是很聪明，他在大学的表现出色极了，一直到战争爆发。他是牛津划船队的一员勇将，得过奖。还有，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出色的业余钢琴家。他真是一位令人惊叹的多面手……可是有一个事实是，离开牛津大学后，人们对他所闻甚少。当然，大战打断了他

的学业。他很年轻，我相信他能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

“他被炸了，”怀兰特说道，“但不是伤得很厉害。在法国他因此获得了一枚金十字勋章。后来我知道他又回到了牛津大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21年他去了东方，掌握了数门东方语言，因此无需经过任何初试便谋得一职，他有好几个学衔。”

拉瑟福德呵呵笑道：“那么，当然，这就说明了所有问题。日常工作不外是翻译外交官的便条，端着茶杯又喝又笑。历史将永远对这些辉煌灿烂的篇章严加保密。”

“他可是在领事馆工作，并不在大使馆。”怀兰特傲慢地说。很明显他并不计较针对他的诙谐之语。而且当我们又开了几句类似的玩笑后，拉瑟福德起身要走，他也不表示反对。总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说我也要走。

当我们俩告辞的时候，怀兰特依然是那副静得令人难受的官样礼貌态度。但桑德斯却非常亲切，说他希望今后有机会再见到我们。

隔天一大早，正是可以呼呼大睡的时辰，我却得去赶一班横贯大陆的火车。我们正在等班车时，拉瑟福德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旅馆里度过这段间隙，他说他有一个套房，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我说这正中下怀。他答道：“很好，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谈康韦，除非你对他的事毫无兴趣。”

我说尽管我不太认识他，但我还是有兴趣的。“他在我进校的第一学期末就离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有一次他对我特别好，我只是一个新生，可他并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小看人。虽然只是件日常小事，但我始终牢记心上。”

拉瑟福德颇有同感。“是的，我也非常喜欢他。如果你

算一算时间，就知道其实我见到他的时间同样少得可怜。”

接下去的沉默多少有些怪异，沉默之中很显然我们双双都在思考着一个与我们萍水相逢却又事关不小的人。我经常发现不少人见了康韦几面，此后就对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做为一个青年，他确实是杰出的。至于我，是在一个崇拜英雄的年龄上认识他的，因而对他的记忆相当浪漫。他个头很高，长得非常帅。不仅在比赛中获胜，而且夺取学校中每一件他想夺得的奖品。一位相当多愁善感的校长曾称赞他的成绩是“荣耀的”，从此他就有“荣耀的康韦”的雅称。也许只有他能保持下这个绰号，我记得他在学校“演讲日”用希腊语的讲演是首屈一指的。他身上颇有一些伊丽莎白时代的气息，他多才多艺，英俊潇洒，生机勃勃地把智慧与体魄溶为一体。当今我们的文明已不大哺育出这样的才俊了。

我把这些对拉瑟福德说了。他答道：“是的，确实如此。我们为这种人用了个特别轻蔑的词儿——‘半瓶醋’。我想总会有人叫康韦‘半瓶醋’的，例如象怀兰特那样的小人。我实在无法忍受怀兰特的那副样子——总是那么一本正经，妄自尊大，完全是一派学校督察长的神态。你注意到了吗？说什么‘要注意他们的荣誉’和‘切莫搬弄是非’。我与这些外交官先生格格不入。”

我们默默地坐在车里，车驶过了几个街区，而后他继续说：“但是，今晚我有着独特的收获，听到了桑德斯讲有关巴司库的事儿，你知道吗，这事我过去听说过，总是半信半疑。它更象是一个传奇故事，我看不出有多少理由相信它，相信的理由最多只有一丁点儿。可现在却有了两丁点儿。你知道我绝非那种轻易相信他人的人，我一生中花去大量的时间在周游世界，我深知如果有幸能亲眼目睹，就知道世界之

大，无奇不有。但如果你听来的是第二手的，那么就真假难分了，可是……”

他突然觉察到他所说的并不太使我感兴趣，于是便哈哈笑道：“但有一件事是无疑的——怀兰特并不值得我信赖，相信他就如同把一首壮丽的史诗卖给刊登乳房的小报。我情愿在你身上试试运气。”

“你在恭维我？”我说。

“你的书使我对您产生了信赖感。”

我一直未提起我写的那部相当专业性的著作（无论如何，一个神经病学家的专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然而拉瑟福德居然有所听说，这令我又惊又喜。他接着说：“我之所以对你的书有兴趣，是因为康韦曾一度丧失记忆力。”

我们来到旅馆六楼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旁敲侧击，事实上我知道康韦并没有死，至少在几个月前他还健在。”

在狭小的电梯口谈论此事，似乎不太合适，几秒钟后在通廊里我应道：“你确信他没有死？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打开房门，说：“因为去年11月，我与他同乘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驶往檀香山。”接着他不再说话了。

当我们坐在扶手椅上，喝着饮料抽着烟的时候，他才又开口：“你知道，去年的秋假我是在中国过的。我总是四处周游。我好多年没见到康韦，我们也从未通过信，我不敢说他经常浮现于我的脑际。但如果我想回忆时，我仍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起他的容貌。当时我到汉口拜访一位朋友，而后乘上一列返回北平的列车。在车上我碰巧与一位非常可爱的法国慈善团体的女教士交谈了起来。她要去重庆，她的修道

院在那里。因为我懂得一点法语，看来她乐于和我谈工作拉家常。老实说，我并不是很赞同教会办什么事业，但我仍准备象当今许多人那样，承认罗马教廷能独具一格，努力工作。这位法国小姐提到了一位几周前送进医院的发烧病号，他们认为他准是一位欧洲人，可他却说不出自己的身世，又没有任何证件。他穿着当地的服装，而且破得不能再破。当他被修女们搀扶进来时，已经病得只剩一口气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讲得相当漂亮，我的这位列车女同伴肯定地告诉我说，该病号在明白修女们的国籍之前，用的是非常纯正的英语招呼她们。我说这样的语言天才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我逗她说，她是怎么探明一种她不懂的语言的纯正度。我们开着玩笑，东拉西扯地海聊。最后她说如果我碰巧到她们那附近，欢迎我去她们那里玩。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就象我不可能去爬喜马拉雅山一样。当列车驶抵重庆时，我们握手道别。我为我们的路遇已告结束深表遗憾。

“然而几小时后我竟又重返重庆。当我们的列车继续前驶一、二英里后，机车发生了故障，于是它好不容易把我们拖回了重庆车站。在那里我们被告之新机车要在12小时后才能换上。这类事情在中国铁路上是屡见不鲜的。既然有半天的时间，我便决定接受那位女士的邀请，拜访一下她们的慈善医院。

“我受到了她们热情的欢迎，这多少有点令人受宠若惊。最令非天主教徒难解的事情之一，便是天主教是如何能那么容易地把讲究形式的僵化刻板与宽宏大量的亲切随和结合起来的？那家慈善医院的人是一群令人愉快的伙伴。我在那里呆了还不到一小时，就发现餐饭已准备就绪，一位年轻的中国天主教医生陪我用餐，并一直用英法混合语与我愉快

地交谈。其后，他与女修道院长一同领我参观他们引以为豪的医院。

“我告诉他们我是作家，他们头脑倒单纯得很，一下认定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去。我们从一张张病床前走过，医生则边走边进行介绍。当时我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位会说一口纯正英语的神秘病号。女修道院长提醒我，说我们正走向他的病床。他看上去已经入睡，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

“他们建议我用英语招呼他，于是我便脱口而出‘下午好。’那人突然一下抬起眼睛，回答说：‘下午好。’听话听音，他确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还来不及感到惊讶，就已经认出他来了。尽管他满脸胡须，面容大改，而且我们多年未见，但我认出他就是康韦。我不会认错的，但是如果我再迟疑一下，那么就完全可能得出他不是康韦的结论。幸好在认出第一眼的冲动中，我就冲口而出，喊出他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但他却呆望着我，没有任何表示。我充满了自信，自己绝没有认错，过去他脸上有一小处独特的肌肉抽搐，我仍记忆犹新。还有他那双蓝眼睛，我们经常说是‘剑桥蓝’而非‘牛津蓝’。除此之外，他就是那种不会叫人认错的人——看他一眼，识他一生。当然，医生和修道院长双双大为激动。

“我告诉他们，我认识此君，他是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认不出我只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在震惊中同意了我的见解。我们对他的病状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他们对康韦是如何能以那副样子来到重庆的，怎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长话短说吧，我因而在重庆一下呆了两周，希望多少能导引他记起事情来。尽管我没有成功，但见他恢复了健康。我们谈得很多，当我坦率地告诉他我是谁以及他的身世

时，他驯服而平静，并不争辩。尽管他的神志仍处在朦朦胧胧之中，精神上尚显得相当愉快，并且乐于我的作伴。我提出由我带他回家，他只是说他无所谓。这真是有点令人气馁，他明显地缺乏任何个人的欲望。

“我们回国的事很快就办好了，我在汉口的领事馆办事处中有一个熟人，因而必不可少的护照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在我看来，为了康韦的命运，整个事情还是避开公众的注意和报纸的头条为好。为此我可以高兴地说我是成功的。否则这对报纸来说，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啊！”

“我们是循着相当常规的路线开始了离开中国之行的：乘船从重庆来到南京，然后转换火车到上海。当天晚上有一艘日本的客轮从上海驶往美国，于是我们便马不停蹄，匆匆踏上了甲板。”

“你真是为他费尽了心血。”我说。

拉瑟福德并不否认。“我想我可从来也没有为任何其他入做过如此大的奉献。这是因为他有与众不同的吸引力，总是那样的，很难说得清楚。这种吸引力使人干起事来乐而不疲。”

“是的，”我同意道，“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让人难忘的吸引力，甚至现在我仍记忆犹新。当然，我脑海中的他依然还是一个穿着法兰绒运动衣裤的男生。”

“康韦是杰出的，这是没说的。战争之后，人们说他不同了，我也认为他是不同了。但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觉得，他有那么多的天赋，应该大有作为。在女王陛下当差，可算不上什么大事业。康韦本来是，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伟人。你和我都认识他，我想我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即便是我和他在中国相见时，尽管他头脑空空，可仍然独具那种奇特的魅

力。”

拉瑟福德沉思片刻，然后继续说道：“你可想而知，我们在船上恢复了往日的友谊。我尽可能多地把我知道他的事告诉他。他听得很认真，认真得近乎有点可笑。他对于自己到达重庆以后的每一件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另一件可能会叫人感兴趣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语言，各种语言。例如，他告诉我，他准是与印度有过什么关系，因为他能够说印度的兴都斯坦语。

“在横滨港，船开始客满。新上船的乘客当中有一位钢琴家叫西弗金，正在世界各国进行巡回演出。他与我们在同一个餐桌用餐，有时与康韦用德语交谈。这就让人觉得康韦在外表上是多么地正常。他除了丧失记忆之外，在正常的交往中显然毫无二致。

“船驶离日本数日后，西弗金在众人的劝邀下，在船上举行了一场钢琴独奏演出。康韦和我一同前去欣赏。西弗金出色地演奏了一些巴赫、斯卡利特的作品，然而更多的是萧邦的。我瞥了康韦一眼，断定他对演奏相当欣赏。这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过去是喜好音乐的。演奏结束时，在环绕着钢琴的一圈圈听众们的要求下，西弗金非常和蔼可亲地又奏了几曲。它们几乎全是萧邦的作品，可见他对萧邦的作品非常在行。最后他离开了钢琴，向门外走去，念念不舍的崇拜者们尾随其后，但显然也觉得他已经为大家弹得够多的了。在这同一时刻，一件异常奇怪的事发生了，康韦突然一下坐到了钢琴前，弹奏出一曲轻快悦耳的乐章，但我听不出是什么人的作品。可西弗金一听便兴冲冲地侧回身来，询问他演奏的是什么。康韦在一阵长久而相当奇怪的沉默后，只回答说不知道。西弗金变得更激动，大叫这绝对不可能。

接着康韦显然用尽气力，绞尽脑汁地进行回忆，最后说是萧邦的作品。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西弗金坚决否认时，我并不吃惊。

“不知怎么地康韦突然对这事大为生气——这着实吓住了我。因为在此之前他对任何事情的感情都相当淡漠。‘我的好小子，’西弗金抗辩道，‘我对世上萧邦的每一部作品都了如指掌，我敢向你保证，他从来也没有写过你刚才弹奏的乐曲。他非常有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因为那完全是他的风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写，我敢同你打赌，在他的任何一本作品集中找不到你刚才弹奏的曲子。’康韦听了，最后答道：‘喏，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首乐曲从未出版过。我只知道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是萧邦的学生，……这里还有一首我从他那里学来的萧邦未面世之作。’”

拉瑟福德瞪着我，继续说下去：“我不知道你是否对音乐有所爱好。即便你不爱，我也敢说你能够想象得出西弗金对康韦所奏之曲兴奋不已的原因。我也同样兴奋。对我来说，这是探照出他的过去的一线非常突然非常神秘的光亮——第一缕线索出现了。西弗金自然完全沉浸在音乐的问题里；这的确令他大为困惑。我提请你注意，萧邦早在1849年就逝世了，距今已有近90年的时间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情是令人费解的，但此事至少有十几个证人，包括加利福尼亚一位有相当名气的教授。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康韦的解释斥之为在年代序顺上是不可能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音乐本身却说这是可能的。如果不象康韦说的那样，那么事实该会是如何呢？西弗金确信无疑地告诉我，如果那两首乐谱一发表，那么保证它们会在6个月之内出现在每一位钢琴家演奏会的曲目上。即便

是此说言过其实，仍不失为一家之见。经过了好一阵子的争论之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康韦一口咬定自己的说法。后来他显得很疲惫，于是我便急着想把他带离人群，回去就寝。离去前拍了几张记录性的照片。西弗金说他只要一到美国，就会把一切事情照应妥当；康韦答应届时他会在麦克风前演奏的。我以为不论怎么说，康韦的失信总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拉瑟福德瞥了手表一眼，告诉我要赶火车的时间还绰绰有余，因为他的故事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那个晚上，就是演奏会结束的那个晚上，康韦恢复了记忆。当时上床后，我尚未合眼，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的变化。他的脸绷得紧紧的，那副模样我只能解释为一种压制了巨大哀痛的神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那种悲哀是遥远而广袤的。他说他可以记起每一件往事了。记忆是从西弗金钢琴演奏的时候开始恢复的，最初只是一些破碎不堪的片段。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好久，我任随他用他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方式向我叙说。我对他记忆的恢复感到高兴，但遗憾的是，他竟希望自己的记忆还是不恢复的更好。他抬起眼睛向我致意，这是多么神奇多么崇高的致意，它令我永生难忘。‘感谢上帝，拉瑟福德，’他说，‘您很能为人着想。’过了一会儿，我穿上外衣，我劝他也穿上，然后我们一起漫步到甲板上。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满天星斗，非常温暖。海面看上去惨白而不太自然，象冷凝的牛奶。我们踩着马达的震颤声漫步。我先没提问，让康韦按自己的方式继续说下去。莫约黎明的时分，他开始口若悬河地一直说下去，直说到艳阳高挂的早餐时间才打住。我说的‘打住’并不意味着他在第一阵长谈之后已经无话可说了。在此后的24小时里，他

又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他非常悲伤，因此根本无法入睡。所以我们几乎是不间断地一直谈下去。船将大概在第二天夜里午夜时分可抵达檀香山。那之前不久，我们在舱室里喝了一些酒。他莫约于10点钟离开我，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你不会是指……”我的脑海立即浮起一幅非常平静和不慌不忙的自杀情景。那是有一次我在一艘从霍里斯托驶往金斯敦的邮轮上所见到的。

拉瑟福德呵呵地笑了。“啊，上帝，不会的，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只是从我身边溜走而已。要上岸易如反掌，但是他总是觉得如果我派人去寻找他，他是很难躲得开的。我理所当然地去找他了，事后我得知他到一艘向南驶往斐济的香蕉船上当了水手。”

“这些你是如何得知的呢？”

“完全是直截了当的，是他写信告诉我的。3个月之后他从曼谷寄来一信，信中夹了一张汇票，付还我在他身上的全部开销。他对我表示感谢，并告之他身体状况非常好。他还说他准备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向西北方向，这就是信的全部内容。”

“他想到哪里去？”

“是呀，说得相当含糊，不是吗？曼谷的西北方向笼统得很，例如，连柏林这里都算得上。”

拉瑟福德沉默片刻，往我和他的杯中斟满了酒。这是一个古怪的故事——或者是他把这事说得古里古怪，我吃不准。有关音乐的一段尽管相当迷离，但康韦到了四川的那家教会医院的秘密更令我感兴趣。于是我说出了自己的感觉。拉瑟福德答道，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

“那他是怎么到重庆的？”我问，“那天晚上他一定全部告诉你了吧？”

“关于这事，他告诉了我一些。我真有点荒谬，让你知道了这么多之后，还把剩下的当秘密。但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在你去赶火车之前就是说个大概，时间也是不够的。情况虽然如此，却还有一个更为方便的补救办法，对此我尚有些缺乏自信。但事实是，事后我对有关康韦的故事沉思再三，深感其事关重大。我开始在船上做了一些笔记，后来故事开始抓住我的时候，我产生了冲动。绝不仅如此而已，我要把这些写下的片断汇集起来，写成一部单独的故事。我并不打算创造或改动任何情节，他告诉我的材料相当丰足，他的叙说流畅，有着一一种表达气氛的天赋。再者，我得到那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他这个人。”

他从一个公文包中取出一札打好的手稿。“嗯，这就是，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我想你并不指望我去相信它吧？”

“嘿，这种事情有时很难说得清楚。但我提请你注意，如果你想相信，你就会相信的！无论如何，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带着书稿去赶火车，并在车厢中读了大半。我打算在抵达英国之后，写一封长信与手稿一同寄还。在付邮之前，我接到拉瑟福德的一封短函，说他又出门游历去了，未来数月不会有固定的地址。信中说他将到克什米尔去，进而“东进”。我并不感到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下面便是拉瑟福德书稿的全文。